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联系我们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史研究 >> 中国史学史 >> [专题]周文玖 >> 正文

今天是: 2009-12-11

周文玖: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热

周文玖: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者: 周文玖 转贴自: 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点击数: 178 文章录入: teadmin]

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但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史却没有产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问题才被提出来。本文探讨的是这门学科的产生经过。

一 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的。它的产生是史学近代化所必需,又是史学近代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

(一)“史界革命”与文化史的兴起

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参加变法的志士仁人已感觉到从思想启蒙的必要性,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1](p277)。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这是他试图重新撰著中国通史所阐发的基本理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更是他创建新史的宣言书,是对《中国史叙论》的进一步补充。《新史学》开宗明义即云:“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梁启超的这两篇著作,在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它们吹响了史学革命的号角,把中国史学从旧时代带入个新时代。

“新史学”那时即将形成一种思潮,并非梁氏一人的史学思想。1900年,章太炎写作《国故论衡》,就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目的是为了“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趋势,令人观感”。[3](p329)这反映了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说明文化史观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后不久,汪容宝又发表《史学概论》,虽大,但涉及面很宽,是参考日本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讲义编撰的。1903年,浮田文举《史学原论》,先后有六种译本。[4](p47-56)1907年,吴渊民编译了《史学通义》,张其成、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部分章节,吕瑞庭、赵遽壁编了《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8年,佐熙著有《史学通论》。这些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版,都对新史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尽管在不同著作中有一定的差别,并且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将其作为工具,进行了多年的论战,但毕竟表现出共同的特点:1、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是发展的、进步的、退落的。2、史学的意义是研究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3、坚决摒弃旧史学以王朝更替为核心的做法,而主张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为主旨,写民史、社会制度史、文化史。4、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认为历史研究要借助于他种学科。这四个特点,第一项指历史观,第二项指史学功用,第四项指研究手段。第三项则是史学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新史学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社会制度史、文化史等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了。夏曾佑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反映出研究内容的这种转变。

1916年后,随着一些留学生的归国,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特别是五四运动,迅速掀起的五四运动,把新史学推向第二个高峰,史学革命继续深化。胡适带来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并将运用于史学研究,提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史方法。他于1919年2月出版《中国

纲》（上卷）一书，为用实验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作了示范，在当时影响很大。李大钊是从的留学生。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以后又发表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指出唯物史观对历史要意义：“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之一新纪元。”[5] (p133)“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世界的新曙光。”[5] (p208)1924年，他出版《史学要论》，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炳松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以介绍美国鲁宾逊的《新史学》而知名，在史学理论和历史方面用力颇勤，做出了贡献。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游历归来，潜心著述，在史学理论方面又出版著作多种，影响较大。其他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通践，提出了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法。要而言之，至20年代，新史学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封已奄奄一息了。这一时期，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6] (p6)，“‘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它）又包含‘国渣’”[6] (p6)。他说，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成中国文化史。他认为要对国学进行系统的整理，很重要的一点是进行专史式的整理，他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史。”[6] (p6)胡适认为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显然，提出用专史的形式完成中国文化史，受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在史学理论上对“历史”、“历史学”作了新的解释，说：“历史是不断的变革中其产物的文化。”[5] (p204)历史学“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5] (p206)。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化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李大钊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历史历史学)和特殊历史学。所谓特殊历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产物的文化，包括政治、法律、伦理、宗教、文学、哲学、美术、教育等。特殊历史学也有两个层次，即这些文化的和理论部分。记述部分分别叫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理论部分分别叫政治学、经济学……李大钊还说：“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5] (p217)以后，梁启超讲授的中国文化史就是这种文化史。由此可见，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工作的主要[5] (p217)“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文化史’方面”。[7] (p103)“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分支，就是在这种学出的。

文化史是史学革命、史学近代化的产物。而史学革命本身就包含着除旧布新，对史学批判总结的因素。胡适在谈整理国故的步骤时，提出“结帐式的整理”，说：“一种学术到了一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6] (p8)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倡言“史界革命”，其第“中国之旧史”，虽着眼于批判，但写这节本身却包含“史学史”的思想。史学史作为一门学文化史中凸现出来，取决于史学革命的程度。

(二)关于专史与通史之关系的认识

编写新的中国通史，是史学革命的重要表现，因为通史代表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20章太炎、梁启超都有撰著中国通史的计划，并切实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没有完成。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为《中国古代史》)，也仅写到隋朝。这不能不说是早期缺憾。

对梁启超来说，通史一直是他的最高的治史追求。继《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之注重地理、民族、年代之研究，许多著作的写作都在向通史方面努力，如1902年发表论地文章：《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系》，是他通史理论中关于“地势”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1906年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其通史理论中关于“人种”内容的深化。以后他理与年代》，是关于历史基本要素的理论阐发。在《三十年自述》中，他说：“欲草——中国爱国心之发达。”并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

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记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及其中的大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中国学术通史，也是他的史学研究之大宗，然相比之下，中国通史。他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然那不过是他的“治史之器”。

何炳松在20年代介绍欧美史学理论、历史研究法也很努力，影响颇大。但其用意是为作准备。他编著的《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都非常重视对通史编撰的探讨。他说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8]而，通史编纂，决非易事，靠一人之力难以完成。何炳松、梁启超都认识到通史的编纂需基础，需要专门史家的通力合作。何炳松说：“专史家和通史家应该合作。所谓专史家就是活动中某一部分的人。他们当然有自成一家独立存在的理由，因为他们研究所得的结果可史家作综合功夫的参考。但是专史家要研究某一类人类活动演化情形的时候，也不能不求通史家，因为通史家能够说明一个人类社会中各类活动的共通性怎样，他们相互间的因果关系都是专史家应该具备的知识。这样看来，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们才可希望做想的人类社会进化史。”[9] (p201)他认为，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因为中国通史规模太大，非常困难。他批评研究所抱的野心太大，以为要想整理中国史总要从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称为历史家人都想编一部中国通史，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成功。[9] (p165)何氏以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全书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在论述通史的做法。但梁氏在论述中已清醒地认识与专史的关系。他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多数成立史较易致力。”[10] (史之改造)“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10] (史之改造)如果说梁氏此时因为倾心于通史而无暇考虑专史的话，那么几年以后，情了改变。1926—1927年，梁氏再次讲历史研究法，自谓这次所讲，与几年前讲的不同。他的，称为“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前次是说明一部通史如何做而已，较为详细，偏重专史如何下手”。[11] (绪论)这里再次说明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因为作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部顶好的通史了。”[11] (绪论)从以上何炳松、梁启超的论述和认识，可以看出，为着通史人们已把研究的重点转移至专史上来了。通史的内容自然是以文化史为主，专史则是文化分支。因此，专史的发达，与通史的建设、文化史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作为文化成部分，理当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至20年代可以说出了。

二 梁启超的功绩

最早明确地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出来的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史的做法”，说：“中国的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但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一二十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构想，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1] (论)梁氏的这个提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史学史自发存在的局面，开始将它纳入学科建设的转

梁启超将“史学史”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与它并列的还有道术史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他说：“中国学术不能靠一部书包办，最少要分四部”；“来，未尝不可；然性质既各不同，发展途径又异，盛衰时代又相参差，所以与其合并，不[11] (五种专史概论)史学本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为什么将它独立出来呢？在讲“史学史的做法氏一开始即作了说明：“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其他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资格。”[11] (五种专史概论)他在具体史及其做法”时，对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都讲得很少，就是他向来重视研究的宗教史，也讲得不多，而惟独“史学史的做法”部分，讲得很详细，占的篇幅也最大。可见，他史作为一门专史看得特别重要。

中国史学史的萌芽在传统史学的母体中早已孕育,随着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它日益门类专史,至20世纪20年代,其发育已臻成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明确地学史作为专史提出来,也就是宣布了这门专史的诞生。梁氏在这里担当了“中国史学史”诞生的角色,或者说是“中国史学史”奠基的揭幕人。

“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具体而微地揭示中国5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有以下几个因素:

1. 文化史的发展使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成为可能。梁启超重视文化研究,对文化史的分科研究也很赞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论述“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史、文化专史。文化专史下又分为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且不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划分提出了理由,作出了解释有自觉的分科研究思想。他明确地说,分科研究,“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实得多,有[11](五种专史概论)。

2. 通史建设的宿愿使他晚年更加重视专史的研究。这点上文已述,不再赘论。

3. 通史建设的要求使他更加重视对传统史学的总结。《新史学》中有“中国之旧史”一历史研究法》一书,在第一章简略论述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之后,第二章即为《过去之界》,然后才是“史之改造”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写法本身说明,梁启超认为要改造建立“新”的史学,必须首先对过去史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还说:“凡治各人”,“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底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间关系,而兹种系统,终未由明了”。[10](史之改造)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之中国史学史国史学史叙述得已相当完整,尽管不过一万四千字,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的雏形。到《中究法补编》时,梁启超对总结传统史学的意义的认识更为明确,说:“无论何种学问,要有所贡献,都应该作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达到何种程度。”[11](文物专史做

4. 深厚的学术史修养为他打下了提出“史学史”的知识基础。梁启超在学术史方面造诣年发表学术史通论性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分为六胚胎时期、全盛时期、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近世学术。撰著学术通史,高悬之目标:“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12](第二序言)在《清代学术概言》中,他把中国学术史,以时代和内容根据,分为五期。他在学术史方面的著述确实学术史中包含很多史学史的内容,而且在其20年代的学术史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年学术史》里,史学史的内容得到了加强。深厚的学术史修养,是他能够提出“史学史”之的知识基础。

关于“学术思想史”的做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认识与此前有所不同。此前按如先秦学术、两汉六朝及魏晋玄学等,此时则按内容性质分类。所以尽管梁氏很早就重视研究,却没有把“史学史”自觉地提出来。而一旦当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到专史上,他立即认籍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分量,意识到中国史学史之成为专门学问的必要性。

上述梁启超所具备的四个因素,决定了他成为最早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人。从梁启超国史学史这件事本身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的产生,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社会革命、学术学家个体都在其中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并且三者相互影响。梁启超还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本内容作了论述,提出了关于编写中国史学史的某些困难、原则,并就分期问题表述了初为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其他人的贡献

在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著名史学家也做出了贡献,突出的有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在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前六七年,即1919—1920年间,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学“中国史学概论”一课,并编写了讲义。(注:该讲义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出版,改名《学通论》,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内容包括《中国史学

《中国史学之派别》、《历史哲学》三篇。以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历史分》。从其内容看，该讲义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他认为历史之法历明时者所创。关于史的本义，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以后陈寅恪^①、章太炎等又各有解释。朱氏认为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著作历史，在东汉以前，没有历史官专职，至曹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自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他以德国希脱(Lamprecht今译为兰普勒希特)的理论为指导，说中国史学的发展是“诗最先，纪传次之，年代记最后”[13](p21)。关于中国史学的派别，他认为有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记在中国有长足发展，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他把中国史书体裁分为六类，说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他还提出要重视现当代史的写作。要之，朱氏的《中国史学通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虽然还很简略，却有筚路蓝缕之功。

朱希祖是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史学系后的首届系主任，在任期间，自觉推进史学的“科学”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始资料与实物证据。”[14]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是为推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而开认识中国史学的过去，建设新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运用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的理论，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先河，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1926年，柳诒徵也撰写一本《史学概论》，内分七章，分别是《史学之范围》、《古《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地理》、《史学书》，共约一万二千虽是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其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他在这年还发史学之双轨》，对中国史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分析和归类，说：“吾观近制，冥符古谊，章标曰双轨。一则类举件系，原于《世本》；一则以时属事，本之《春秋》。视刘氏所陈，体，尤为简要，贯通古今焉。夫史域虽广，类例无多，较其大凡，不越二辙。”[15]柳氏在史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如后人所评论的：“盖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大学之主史学讲座者之朱希祖、钱玄同，清华之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皆一时之选；而先生(指柳诒徵)讲隐然与之鼎足而三。”[16](p27)所以，他此时关于史学史的有关论述，也是不应忽视的，革时期总结传统史学的组成部分，尽管观点有些守旧。

继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李大钊又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的原因》。这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显示出唯物史学地解释历史的巨大作用。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注：北京史学系规定的必修课“欧美史学原理”的内容。据傅振伦回忆说，李大钊之后，陈讲类似的课程。(傅振伦：《学习的回忆》，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前1983年7月))。该课程讲义有以下内容：一、史观。二、“今”与“古”。三、鲍丹的历史思想雷的历史思想。五、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六、韦克及其历史思想。七、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九、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十、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值。十一、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李大钊论述的主要是史学思想史，其核心的问题就是唯物史观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进而论述它对于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历史观本身也有它的历史，而且其历史有一定的方向。“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5](p70)李大钊以七个专题，论述了八位的历史思想，涉及到三十多位西方史家。八位学者对唯物史观和科学历史学的形成皆有贡献努力挖掘他们的进步思想，肯定他们的功绩，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国史学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学的灵魂——历史观、历史思想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义和演说的基础

钊于1924年5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出版了《史学要论》。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光辉著作。

李大钊的这些史学活动和理论建树，表明在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已加入了改组史学的行列，将世纪之初的史学革命继续向更高层次推进。“史学思想史”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反映。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李大钊也是揭开20世纪中国史学序幕的人之一。

以西洋史学史为借鉴，从事中国史学史之建设，这是何炳松研治中国史学史的特色。何氏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对西方史学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译的《新史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终结。1925年，他与郭斌佳开始合作翻译美国绍特威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何炳松在《译者序》中这样写道：“译者窃不自量，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对中国史学界少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力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介绍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译者近来有编译《西洋史学丛书》之计划，其故盖译者抱此宏愿大业以数载于兹，终以谋生未遑无从下手。”[14]这段话反映了何氏的心愿，他计划编辑一部中国史学史，并把这一工作视为对新史学的贡献。翻译《西洋史学史》，是为提供借鉴。在他计划编译的《西洋史学丛书》里，还有一部书是英国史学家古奇(Gooch)的《19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也是由何炳松协助翻译，并完成过半，自谓“不期年当可脱稿”。对这两本书，何氏寄予深意，说：“吾人今日所译之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1]上述两部著作，一部详于西方上古及中古史学史，另一部则是近世的西方史学史，二者合起来具有较高价值。可见，何氏编译这套丛书，意在“中国史学史”的建立。何氏本意虽是为撰写中国史学参照，但客观上却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以后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它的意义越来越明显。

何炳松1925年就有撰著中国史学史的志愿，说明他的中国史学史的专史意识是比较早的。1925年下半年，他在上海大厦大学讲授“史学通论”课程。1928年冬，他应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邀请，在中国史学的演化作了讲演，并开始研究宋、元学术思想，为写一部中国史学史作准备。他《中国史学史·自序》中写到：“著者所以要研究这一段中国学术史，本有他的动机。当民国十年，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当时他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然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研究朱陆三家的学说。”[18](p8)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计划中，原计划要出版《中国史学史》，并刊出出版预告，但始终未见此书出版。这些事实说明，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并付诸了行动。他对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先后撰有《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史通〉评论》、《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史通〉序》等论文。刘知几、章学诚是我国传统史学前后两个时期史学理论总结的代表。“吾国史学，以刘知几、章学诚二氏为最著。”[19](p2)何氏对二氏史学著作的研究，是他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表现。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史的重视，反映出西洋史学对中国史学史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经过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倡导和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基本树立起来。30年代，中国史学史专著虽未出现，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大量的史学通论著作的出版，而这些著作，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另外，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史学史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篇幅。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在学术上，一些著名教授在大学里开设此课并印发了讲义。40年代，发表有关论文更多，达22篇。从先秦史学到民国时期的史学，均有研究文章问世。4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此外，还有几部著作，如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壮猷》、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都明确“中国史学史”，但从其内容看，也属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在这一时期范围的开展。教育部把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用书。至此，中国史学史学科形成。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产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到新的高度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4] 俞旦初. 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5] 李大钊. 李大钊史学论集[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6] 胡适. 胡适文存(二)[C].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 [7]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8] 何炳松.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9] 何炳松. 何炳松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10]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饮冰室合集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 饮冰室合集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2]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饮冰室合集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3] 朱希祖. 中国史学通论[M]. 重庆: 独立出版社, 1943.
- [14] 罗香林. 朱逖先先生行述[J]. 文史杂志, 1945, (5).
- [15] 柳诒徵. 中国史学之双轨[J]. 史学与地学, 1926, (1).
- [16] 苏雷渊. 柳诒徵史学论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7] 何炳松. 西洋史学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 [18] 何炳松. 浙东学派溯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9] 金毓黻. 中国史学史[M].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4.

- 上一篇文章: 王世民: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 下一篇文章: 张桂萍: 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上)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1]
-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 当年美远...[91]
- 访问记: 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99]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26]
- 唐德刚先生逝世[232]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59]

相 关 文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 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